

古埃及和谐文化探源*

赵克仁**

内容提要 和谐文化是埃及文明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谐文化是埃及文明能够延续 3000 多年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和谐文化是在尼罗河环境中形成的,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文的因素。自然因素在于古埃及人生活的尼罗河环境、绿洲生态;人文因素在于古埃及灌溉农业孕育出的制度文明,而制度文明的核心内容是埃及宗教。

关键词 古埃及 和谐文化 渊源

古代埃及人给人类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高度发达的埃及文明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精华。在埃及文明中,和谐文化是埃及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我国学界虽有人对古埃及的和谐文化进行研究,但对和谐文化的表现研究较多,^① 而对其原因深究得不够。总体来说,学界对本选题研究的基础薄弱,其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本文拟专题探讨古埃及和谐文化形成的原

* 本文为 2012 年河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古埃及社会教育对河北公民教育的启示”(项目编号:SD124002)阶段成果。

** 赵克仁,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石家庄 050024)。

① 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埃及和谐文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子林在《诉讼与和谐——文献视域中的托勒密埃及诉讼制度》一文中指出,古埃及的和谐理念与我们今天要创建的和谐社会有本质区别,古埃及的和谐理念是潜在的、被动的,而我们今天创建和谐社会是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古埃及的和谐文化是为王权统治服务的,今天的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见《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内蒙古民族大学靳玲的两篇论文《古埃及伦理中的和谐观念》[《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和《古埃及伦理中自身的和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分别论述了古埃及伦理中的和谐观念。此外,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公共教育部用图文并茂的讲解,简述了古埃及的和谐文化。(见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寻求和谐的古埃及文明》,《中国校外教育》(美术),2007年第Z1期,内封)。

因, 弥补学界的不足, 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同时对当今建立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和促进作用。

一 和谐来自尼罗河环境

在一望无垠的茫茫荒漠中, 尼罗河孕育了绿色, 而绿洲的出现使得那一片沉寂的世界喧嚣躁动起来, 关于埃及文明的一切都围绕着绿洲展开。尼罗河给绿洲带来了希望和丰饶。早在史前人类时期, 古代埃及的土地就被纵横交错的沟渠呈直角分割成盆地。因此, 在古埃及祭司们书写的圣书体象形文字里, 正方形依然代表着行政单位诺姆 (nomes, 相当于州)。^① 埃及阳光的强烈, 沙漠空气的清新, 孕育生命之河的馈赠, 总之古代埃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埃及文明。尼罗河诉说着埃及民族的史诗, 两岸的绿洲是埃及人活动的舞台, 金字塔蕴含着埃及人的生命哲学。埃及人清楚, 他们的创造发明以及所作所为, 不能靠外来民族的传授, 而只能靠自己摸索感悟。只有一件事情是确知的, 尼罗河每年都在大致相同的时期泛滥、干涸。由于对尼罗河的依赖, 对于埃及民族而言, 尼罗河在任何时候都是埃及所有事物的判断标准。

与其他文明不同, 埃及文明不是靠侵略和掠夺他人发展起来的。埃及文明的发展模式是依赖自身而非外界, 依赖自然而非战争。这种依赖自身的发展模式是维系国运民兴的基础。这种依靠自身而非掠夺他人的发展模式是人类最早自我发展模式, 实在是难能可贵。近代欧洲的文明国家一直靠向外侵略扩张和掠夺他人而发展自己, 这种掠夺殖民地的发展模式导致欧洲的文明国家之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直到二战结束, 他们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后才幡然醒悟, 改变了这种发展模式。二战后, 掠夺他人发展自己的模式已经成为历史, 国家的发展模式由自我发展模式逐渐演变为冷战后的合作发展模式。古埃及人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已经采取了二战后人类靠两次世界大战才感悟出的这种发展模式, 难道不可贵吗! 因此古埃及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埃及文明也不是建立在侵略扩张的基础之上, 保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埃及文明的生存之道。

^① Robert G. Morkot, *The Egyptian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p. 6.

决定埃及民族历史的，绝不是战争。在这个由绿洲组成的国度里，战争并不能谱写历史。沙漠之中奇妙的绿洲，狭长的尼罗河，也几乎没有邻邦，对内对外都激发不起征服的欲望。埃及的黄金是从努比亚运来的，其他许多物品是从叙利亚带入尼罗河三角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正是贸易促进了这片绿洲与小亚细亚及东非的联系，而不是战争。

埃及神话中有关狮头战神塞克美特（Sekhmet）的传奇故事在充满雄壮之余还满含哀伤情调，原因在于埃及人民憎恶战争。然而太阳神在其年迈时派遣战争女神来到人间，来摧毁对他有所企图的人类。女神降临人间，整座城池浸入血泊之中。当太阳神清晨时分看到遍野的血流时，他震惊了。“我宁愿保护人类免受战争之苦”，他一边哭泣一边对仆人说道，“还是让大地沉浸在迷人的红酒中吧”。^①于是，战争女神再次造访这片大地时，她看到了田野中自己的倩影，于是开怀畅饮，结果酩酊大醉。尔后，她再也不曾光顾尘世，人间从此一片和平景象。

根据记载，第五和第六王朝时期，埃及人曾入侵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但那不过是深入中东腹地追杀偷袭者罢了，并且该事件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记录。^②第六王朝珀辟一世（Pepy I，公元前2289～前2255年）的重臣维尼（weni）曾镇压贝都因人的暴动，把他们驱逐到巴勒斯坦一带。根据记载，维尼进军巴勒斯坦时所率领的“好几万士兵”大都是在行军途中随处招募的。^③其实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主要是雇佣军，基本没有多少正规军，正规军大多是王室的护卫队和边界的巡逻队。

在古埃及3000多年的悠悠历史长河中，埃及只有300年的时间沦为异族统治。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人控制埃及的时间很短，并且占领的也只是部分地区。即使是喜克索斯王朝^④，除了他们首次使用马拉战车和一则幽默故事流传下来之外，在埃及境内别无所存。那个故事涉及居住在三角洲地

① Byron E. Shafer, ed. *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 Gods, Myths, and Personal Practi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0.

② Robert G. Morkot, *The Egyptians, An Introduction*, pp. 100-101.

③ Barry. J. Kemp,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26.

④ 喜克索斯人（Hyksos），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塞姆族游牧部落，公元前1674年侵入埃及。他们越过西奈半岛，并以尼罗河三角洲的阿瓦里斯为中心，建立“牧人王朝”。王位共传6代，相当于埃及15、16王朝，公元1548年被埃及人驱逐。

区的国王，他给在尼罗河上游底比斯亲王捎去口信，要求将所有的河马杀掉，只因为它们的喧嚣扰乱了他的美梦。^①历史上入侵埃及的三四个异族并未留下任何东西，埃及的征服战争也没有为其自身带来任何历史转折或变革。埃及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征服者如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三世、塞提一世等，如今只有历史学者还能知晓他们深入幼发拉底河及青尼罗河征战的史实，当今的人们惊诧的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雕像，并为其神庙的恢宏与气势所感慨。在拉美西斯二世 67 年的执政生涯中，从未发起过进攻，并把北部叙利亚拱手送给了仇敌赫梯人，之后还与他们结成盟友。^②绿洲环境并不培养士兵，君主们只好从努比亚或者亚洲囚犯中招募士兵。

在没有战事的日子，埃及的陆军被派去修建金字塔、神庙、挖掘沟渠或者开矿，而海军则会开展海洋商业探险活动。在女王哈特舍普苏特 (Hatshepsut, 公元前 1503 ~ 前 1482 年在位) 神庙的壁画上，描绘着公元前 1470 年埃及海军的一次远征，目的地是非洲东海岸上的神秘国度蓬特。这支舰队如同中国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是以和平的姿态远航的，返回时从蓬特带回许多特产，如香料、没药、黄金、象牙，甚至狒狒。^③可以说，哈特舍普苏特的远航是和平贸易之旅。

二 和谐来自绿洲生态

古埃及优越的地理条件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同时位于尼罗河流域的努比亚与埃及的情况截然不同。尼罗河河床上的岩石将努比亚尼罗河和埃及尼罗河区分开来。花岗岩和石英砂岩以六大瀑布的形式出现在尼罗河床上。这极大地限制了努比亚灌溉农业的发展，沿岸 750 英里长的土地，只有 1 ~ 3 英里宽的区域得到开垦。然而阿斯旺以下，洪水进入古埃及王国境内，从地质学角度来讲，绝大多数都是石灰石，尼罗河从松软的白垩色泥土中，掘开开阔的河床。直到这里尼罗河才将携带了 1000 多英里的淤泥沉积下来，

① Robert G. Morkot, *The Egyptian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p. 115.

② John A. Wilson, *The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p. 243 - 244.

③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II, New York, 1962, pp. 246 - 295.

然后就形成了比苏丹境内流域面积大 15 倍的肥沃土地。^① 在埃及，绿色田野到黄色沙漠之间实际上也就咫尺之遥。古埃及的土地向人们展示了河水如何征服沙漠，两岸的人们如何顺应自然，而太阳主宰一切的真实而令人钦佩的图景。

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沙漠中绿洲的生态是脆弱的，人类只是绿洲生态中的一个环节。面对残酷的自然，脆弱的生态，埃及人的命运与绿洲生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态环境决定着埃及人的生与死，定夺着埃及人财富的多寡，关系到埃及人身体健康的程度。尼罗河养育着埃及人。人与尼罗河的关系是一生共生、一毁俱毁的关系。埃及人都是尼罗河的子民。由此埃及人把维持绿洲的生态平衡提高到最高层面，对滋养他们的尼罗河、哺育他们的太阳产生出极大的敬畏感。他们认为这些影响他们命运的自然因素就是神，对他们顶礼膜拜。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②“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③ 在古代，自然崇拜是埃及宗教的重要内容，直到古埃及时代结束都难以替代。

随着自然崇拜的发展，埃及人更加渴望生命。埃及人认为凡有旺盛生命的东西都是美的，是值得赞美和崇拜的。这时，埃及人的自然崇拜集中体现在对有生命的动植物的崇拜。^④ 随着人们对动植物知识的增加，人对自身仍然无知和迷茫，于是埃及人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人身上，一些动物神也被人格化。埃及人认为，人也来自自然，人具有强壮的身体，旺盛的生命力标志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长短成为衡量人与自然关系的标准。所以埃及人既关注死亡也关注生命。在埃及宗教中，死亡是人生命的另外一种形式，而并不是人生命的终结。人以灵魂的形式继续在冥界生活。埃及人对生命的热爱一直依靠强壮的体力来维系。

① Robert G. Morkot, *The Egyptian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pp. 19 - 20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3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220 页。

④ 参看拙文《古埃及动植物崇拜及其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1 期。

埃及宗教对人死亡后永恒的世界的描述中,依然把阳光照耀和尼罗河庇佑而得到的健壮的身体、容光焕发的面容作为来世的最佳境界。可以看出,埃及人对生命之爱表现得多么浓烈。强壮、健硕,这是古埃及人一生所求的东西,因为它们能赐予生命以力量,但这大概也算得上是古埃及人感情与思想上的局限。当沙漠无边无际延伸,在尼罗河所创造出的那条狭窄而繁茂的绿洲,当地的埃及人一边撷取着丰盈的果实,一边享受着生命的欢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沙漠地带的人们则常常暗自悲伤。这种反差比苍茫的暮色更能发人深省。一边是茫茫的沙漠,一边是茵茵的绿洲,大自然赋予埃及的绿洲生态环境,使埃及的宗教与哲学诞生了:对生命之顶礼膜拜,成为死亡之祭礼的前提。没有绿茵的沙漠是无法孕育文明的。绿洲是埃及文明的基础。埃及文化就是绿洲文化。

为了准确预测尼罗河的水位,埃及的祭司们需要去观察星辰,从中找出星辰与尼罗河水流之间的关系,以便计算河水涨落的时间,而对涨水高度的计算引发了对海拔的测量。埃及的天文地理知识都是在观察尼罗河的过程中产生的。由于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水不断刷新着尼罗河下游三角洲地区的原野,人们用来标示土地的分界线每年都被大水冲毁,这就促使了对土地面积的丈量,在保护财产和解决土地纠纷的过程中,埃及产生了几何、算术等学科,同时也创造出宗教、法律,产生了公平、正义的社会概念。总之,埃及文明是在绿洲生态环境下产生的。

通过对古代埃及文献的阅读,这个民族的面貌与活力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个国度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较长的生命,在这里人类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平等的概念。奴隶制在埃及的存在显然比稍后的希腊或基督教国家中更为合情合理。这个民族蔑视死亡,珍惜生命。耄耋之年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公元前1303~前1213)在塞德(Sed)节上,举行了一场亲自参加的体育盛会,祝愿自己永葆青春,并决定每年都举行这样的仪式,直到自己年逾九旬。^①由于现世的短暂,埃及人更多地将希望寄托于来世。为了在来世永生,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保存尸体,人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有专科医生。令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感触良深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即

^① Samuel Henry Hooke, *Myth, Ritual, and Kingship: 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Kingship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in Israel*, London: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1958, pp. 67-72.

除利比亚人外，埃及人是他所见过的最健康的人种。它指出埃及人如此健康的根源，在于当地温和的气候。^① 在众人参与的体育运动中，法老们毫无畏惧，亲自上场，大显身手。国王之间的决斗得到习俗的认可，甚至在惯例上也有所规定。

流传至今的历史文献和文明遗迹，若非当地的稳定气候也难以保存下来。埃及一年三季，气温变化不大。正是干燥的气候，才使那些蕴含着埃及历史的坟墓和纸莎草经受住了岁月的侵蚀。当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III，公元前 1197 ~ 前 1166 年在位）完好的头颅骨被考古学者发现时，他似乎在无声地讲述着过往的岁月。我们通过 DNA 检测后知道了他是谁，并将其与文献上的记载相联系，于是历史在这一刻复活了。^②

生活在沙漠中的埃及人，只有顺应自然才能生存，埃及人的一切成就都是适应绿洲环境的产物。茫茫沙漠，沙石遍地。在这样的条件下，埃及人充分利用环境，通过石头表达自己的思想，展现自己的才能，创造了巨石文明。埃及人在石刻作品中渗透其和谐思想，表达他们追求永生的理念。雄伟的金字塔、巍峨的神庙建筑，成为埃及文明的象征。埃及没有茂密的森林，甚至连黄铜都要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在 30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埃及人对石刻风格的感知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此期间，除了昙花一现的阿玛尔纳艺术外，艺术界很少发生革命，没有什么能够动摇这种信念。

三 和谐源于灌溉农业

沙漠之中，延伸着一条大河，河水滋润着两岸的土地，一条狭长的绿洲呈现在埃及干旱的原野上。这就是埃及！埃及所有的财富都源于尼罗河。它拥有绵延 6000 公里的河道，如同日月星辰，有规律地升降起落。在埃及，尼罗河是世间万物之源，每年在固定的时间里河水上涨，然后退出河床，涌入平原，将肥沃的泥浆沉积于平坦的土地上。这时，埃及所有的村庄都被河水隔绝开来，只有小船能够往来其间。从空中鸟瞰，村庄星罗棋布点缀着尼罗河水泛滥的区域，好似棕榈树的叶子漂浮在水面上，不计其数。

①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 143 页。

② Rosalie David, *The Ancient Egyptians: Beliefs and Practices*,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8, p. 138.

自然因素决定了埃及文明的基础是绿洲文化,因此维护绿洲的生态平衡,建立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方式成为埃及人的头等大事。

尼罗河历经数千公里的流程来到埃及,它没有给人们造成灾难,很少破坏埃及人的家园,它的到来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创生的力量,去滋润一片土地,为沿岸的居民带来绿色与生命。尼罗河每年都要刷新埃及的土地,即便在通常意义上的潮涨潮落的季节里,它也特立独行。在古埃及人的眼中,洪水泛滥是作为尼罗河神性的具体体现。因为泛滥的洪水中具有孕育生命的神奇力量。夏天,当遍布全球的河流水位在下降或者干涸时,它却咆哮着涨起大水。埃及的新年因此被确定为 7 月。每年 6~9 月,尼罗河在上埃及的水位涨幅达 13~14 厄尔(埃及丈量单位,1 厄尔等于 45 英寸),三角洲地带为 7~8 厄尔。^①埃及被称为尼罗河之子,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古埃及人只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并全力开发尼罗河流域的农业,才能将有利的条件变为丰收的果实。充足的阳光、丰沛的水源和埃及人辛勤的耕作,三者的紧密结合,孕育了古埃及大部分的财富。这几种因素的和谐运作,让古埃及得以生产出与人口需求持平的粮食。

从远古开始,埃及人就开始了水源的治理和对灌溉的控制,先是顺其自然,然后是人工治理。为了农业灌溉,治理水源与疏通河渠成为人人都得参与的事业,不管他是庄稼地里的农夫,还是政府部门的高官。从广袤而恶劣的大沙漠中求得农田,从河谷中争取更多的肥沃淤泥,是埃及人追求的目标。尼罗河的泛滥虽有规律,但每年的水量有很大差别,因此需要居民团结合作治理洪水。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简单的分工应运而生,一些人成为船夫、农夫,一些人成为工匠、文书。

古埃及人测量尼罗河水位的方法可以上溯到古王国时期。考古学者在阿斯旺和开罗发现了 20 个古代埃及留下来的尼罗河标尺。它们是以大理石井的形式出现在尼罗河两岸,井的边缘刻有一雌一雄两只铜铸老鹰。涨潮的第一天,国王率领祭司们一边祈祷一边打开水井,所有的人都恭候着,聆听究竟哪只老鹰最早鸣叫。如果雌鹰首先鸣叫就意味着灾荒;如果雄鹰鸣叫则预示着一场大洪水的到来。^②百余天内,这条雄浑有力的河流,肆意摆布着这块充

① A. Moret, *The Nile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R. T. Clar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30.

② (德)埃米尔·路德维希《青白尼罗河》下册,郭院林等译,花城出版社,2008,第239页。

满期待的土地，然后以天神的姿态撤回到未知的世界中。它的身后留下的只有那象征着它存在的神庙，还有日夜守护着它灵魂的祭司。在埃及，尼罗河一直作为神明深受沿岸居民的膜拜，受到它所征服的人们的敬仰。

尼罗河水是如何形成的？这在法老时代是如此神秘，它像谜一样令埃及人琢磨不透。而如今尼罗河形成之谜这层神秘的面纱已经被揭开。它是由印度洋上的季风冲击埃塞俄比亚高原而形成的降水形成的。即便如此，人们仍无法估量它的威力。因为没有人知道季风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也没有人能提前推断出云层形成的条件。因此，我们也就无从得知埃塞俄比亚的降雨量以及青尼罗河的流量，以及沿着青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滚滚而下的洪水力量。不过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到埃及旅行之前，古埃及的法老们已经可以精确计算出河水的流量，并根据计算的结果分配水量。当时人们在祈祷中要求得到16厄尔的水量，可见16厄尔意味着高水位。这也是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上尼罗河神像周围雕刻了16个孩子的寓意。古罗马作家普林尼（Gaius Plinius，公元23~79年）在他的《自然史》中用罗马人简练的方式表达了埃及人的观点：“12厄尔以下预示着饥荒，13厄尔表示充足，14厄尔显示欢乐，15厄尔代表保障，16厄尔象征丰收。”^①在古埃及，一切国计民生都依赖于尼罗河，充分验证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千年古训。

当洪水到来之际，埃德富的农民看着祭司们用尼罗河标尺测量出的水位读数，并将其与法老的表格相对照，他们对政府的神性陡然之间充满信心。法老宣称自己是“荷露斯之子”的神话，由于他对未来丰收图景的准确预测而更具震撼力。法老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农民带着从未泯灭的好奇心关注着河水对法老的服从程度。他命令尼罗河水上涨，农民在神庙中听到，河水在即将跌入炼狱的瞬间，听从了法老的指示。然后，他们又听到祭司们低吟起古老的尼罗河赞美诗，以此呼唤尼罗河神的庇佑，这些尼罗河之歌至今仍被保留在底比斯的神庙中。^②作为自然力量，尼罗河是黑暗而令人恐惧的；在埃及境内，汪洋般的洪水滋润着广袤的原野，埃及人

① （德）埃米尔·路德维希 《青白尼罗河》下册，部院林等译，花城出版社，2008，第239页。

② A. Moret, *The Nile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R. T. Clar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30-31.

对神圣的河水，做到了充分的利用。每一块盆地都是农业省份的中心，每一个诺姆都依赖着邻近地区，每一个诺姆长在管辖区内河水时都要顾及下一地区。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向中央机构呈递诉求，从中央政府接受命令。如此这般，由于尼罗河流域农业灌溉的需要，等级分明的君主体制在埃及形成了。

在尼罗河狭长的绿洲里，埃及民族逐渐兴盛起来。农业灌溉使埃及社会有了明确的分工，而劳动中的分工协作使埃及人凝聚成为一个共同体，和谐有序的埃及社会形成了。

四 和谐来自制度文明

埃及的制度文明与尼罗河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在阳光炙烤的沙漠中，即使是在尼罗河绿洲里，一个人如果单枪匹马不与他人合作的话，很难逃脱死亡的厄运，于是在这里诞生了集体主义精神。因耕作和治理洪水的需要，远在象形文字出现之前，尼罗河流域就出现了第一个有组织的人类团体，埃及民族造就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它的问世是如此之早，在当时甚至连“国家”这个名词都还没有出现。在这个社会里，集权和服从应运而生。

法老政府的和谐文化是围绕着尼罗河展开的。尼罗河从埃塞俄比亚高原一路狂奔，在绿洲中蜿蜒曲折前行，抵达下游埃及境内，最后流入地中海。由于缺乏水利枢纽工程的控制，尼罗河水会在下游泛滥，变得难以控制。为了阻止诺姆长为争夺河水与耕地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法老尝试将君权神授的思想灌输到人们的脑海中，并由此使他们产生敬畏心理。法老对国家的统治则通过建立祭司等级制度来巩固。通过宗教强化法老与神灵的联系来神化法老，培养官员们敬畏神灵、履行对国王的职责，成为法老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尽管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他的私有财产，但法老终日惶恐不安。除非他能掌控尼罗河，能够疏导河水，增加粮食供给。否则洪水泛滥期间，自然环境造成的混乱将使他丧失所拥有的一切。与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君主不同，当同时代的君主们凭借自己掌握的权力和实力，倾注于对外发动战争，通过掠夺来壮大自己的时候，此时的法老，却将主要精力倾注于逐步完善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建

设。尼罗河流域的生存法则驱使法老政府，必须想方设法教化民众，让民众安心于农，而不是崇尚武力，颂扬战争。法老要建立的是一个和谐的农业社会，而非军事独裁政府。

可以说从埃及统一后的开国君主开始，埃及就努力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众所周知，埃及历史上第一位统一王朝的法老是美尼斯（Menes）。美尼斯虽然通过战争手段征服了北方，完成了南北政治上的统一。与一般征服者的做法不同，美尼斯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将自己加冕为整个埃及之王，强迫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服从自己的统治，而是不厌其烦地举行了两次加冕仪式。他先在被征服的下埃及封自己为下埃及的国王，戴上了象征下埃及的红王冠；然后他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举行了一次上埃及国王的加冕典礼，戴上了象征上埃及的白王冠。这样，便使他成为头戴红白两个王冠的“双冠王”。他宣称自己是“上下埃及之王”。^①自此，继任的国王在十余年间都沿用此王号，同时必须具有双重身份。他用这种并不鲁莽的方式，迅速抚平了下埃及人因战败而留下的痛楚。下埃及的神灵和图腾，以及宗教信仰被完整地保留，并且在日后的岁月中逐渐与来自南方的神灵与宗教信仰进行融合，这就为埃及王朝建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加强民族融合，巩固其统治基础，美尼斯没有把上埃及的都城作为统一后的首都，而是在河谷和三角洲的交界处，也就是原上下埃及的交界处建了一座新首都孟菲斯，被称为“白城”（White wall）。^②可见，从埃及第一王朝开始，美尼斯追求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最有效的手段是文化的融合与统一。没有文化上的融合，多元就是混乱。美尼斯采取的保留被征服地区文化的怀柔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方法对以后埃及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埃及多元和谐文化的基础。

埃及宗教体系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初的埃及宗教是自然崇拜，自然崇拜对维护尼罗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宗教的发展，埃及宗教出现了社会化和人格化的神，由此埃及神灵经历了一个合并的过程。进入王朝时代，太阳神是社会化的神，是国家

① Christiane Ziegler, *The Pharaohs*,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2, p. 19.

② Rosalie David, *The Ancient Egyptians: Beliefs and Practices*,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8, p. 17.

崇拜的主神，之后是尼罗河神奥西里斯，再后来出现了更为抽象的玛阿特女神。^① 玛阿特是埃及建立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神灵。

在古埃及神灵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玛阿特 (Maat) 是位长着翅膀、头顶上饰有羽毛的女神。^② 根据埃及宗教神话，她是智慧之神托特的妻子，太阳神拉的女儿。玛阿特既是宇宙秩序的化身，又是真理、公平与正义的象征，是古埃及人对自然和社会认知的抽象概括，涵盖了宇宙秩序、社会秩序、个人修养等领域，代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其内涵包括“真理”“公理”“正义”“和谐”“秩序”等^③。它的内涵是如此丰富，一些学者认为玛阿特是难以翻译成现代词汇的，因为现代语言中难以找到对应的单词。玛阿特的本质是平衡与秩序。玛阿特喻示着宇宙的平衡状态：和谐有序。如果失去玛阿特整个世界将失去平衡，天翻地覆，动荡不已。古埃及宗教宣扬君权神授，法老的权威来自玛阿特，法老代替玛阿特管理着人间的秩序。如果没有法老人间将大乱，不再有秩序，不再有公平正义。法老是神的代言人，人神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建立在遵守玛阿特的基础之上。

古埃及没有成文的法典，在某种意义上，埃及的律法包含在宗教文化之中，形成所谓的法文化。古埃及女神玛阿特就是法律与正义。她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维系着社会的秩序，而法老也以玛阿特女神的名义管理着国家。为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法老每年都要到神庙亲自祭祀玛阿特女神。给玛阿特女神丰厚的奉献。通过祭祀玛阿特的宗教仪式和供奉玛阿特女神，法老取得了统治人间的权力。^④ 法老通过玛阿特赋予的权力和法力，保障人间秩序、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平衡运转，为臣民带来真理、公平、正义和秩序。法老是尘世间活着的神灵，是埃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既是施政者又是最高祭司，负责传达神灵的旨意。法老的宗教职责是利用他与神灵的关系和玛阿特女神赋予他的法力，确保尼罗河洪水每年定期泛滥，保

① Adolf Erman, *Life in Ancient Egypt*,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1, pp. 269 - 270.

② Pascal Vernus, *The Gods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Publisher, 1998, p. 187.

③ John A. Wilson, *The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 119.

④ Richard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Templ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0, p. 89.

障农业丰收；他的世俗责任是治理尼罗河绿洲，开沟挖渠，丈量土地，分配水源和土地，确保埃及的社会稳定。按照埃及宗教，法老具有治理自然与人类社会混乱秩序的双重力量。所以，埃及阳光充足、河水丰沛，人民富裕，社会秩序井然，这些都应归于法老的神力。

法老也只有在自称为“哈皮之子”（The son of Hapy，哈皮为尼罗河神）时，才是真正神的后裔。^① 法老畏惧的不只是尼罗河，还有疾病。因为疾病终结的不仅是他的权力，也会终结他的生命。祭司们会杀死染病的法老以便使其灵魂传递给另外一位强壮的继承者，这种说法的唯一可靠证据来源于尼罗河中游的麦罗埃（Meroe）。根据宗教仪式而发动的谋杀行为，在上尼罗河的希卢赫（shiloh）地区，习惯上得到人们的默认。一旦战争失败或农业歉收，法老就面临着被废黜的危险。

在埃及，对女神玛阿特的信仰还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按照埃及宗教，人死后，灵魂会进入冥界接受冥神奥西里斯的审判。如果他在现世遵守玛阿特，一生清白，则可以顺利进入一个无忧无虑的永生世界，也就是来世。如果他在现世违反玛阿特，一生作恶多端，则会受到惩罚，打入阴冷潮湿，毒虫遍地的地狱，永远不见天日。玛阿特不仅是活人要遵守的道德规范，也是判定亡灵能否进入来世的标准。在古埃及《亡灵书》所描述的亡灵审判仪式上，冥神奥西里斯端坐在座椅上，周围有42位陪审的神职官员，神灵托特用一杆天平来称量死者的心脏。天平的一端放着亡灵心脏，另一端则放着玛阿特女神的羽毛，只有一生做的善事多于恶事，心脏才能与玛阿特的羽毛等重或比她轻。^② 若善大于恶则灵魂进入永生的来世；若恶大于善，则心脏会被等在旁边的怪兽吃掉，灵魂被打入地狱，永不得进入来世。为了顺利通过审判，人们必须在现世敬拜神灵，行善积德，按照宗教设定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只要在现世遵守玛阿特，也就是现存的社会秩序，无论贫贱、无论地位高低，亡灵都会通过冥神奥西里斯的审判进入来世，一个永生的世界。按照埃及宗教，玛阿特被认为是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象征。在埃及这个神权政治统治的国度里，法老是埃及万事万物的中心，集神权与王权于一体，是沟通现世与来世，神界与人间

① Paul Johnson,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Atheneum, 1978, p. 12.

② Byron E. Shafer, ed., *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 Gods, Myths, and Personal Practi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2-93.

的媒介。法老被认为是诸神的代表，代替神灵来管理埃及。尼罗河水的定期泛滥、农民的丰收、商业的繁荣、军队的强大都有赖于法老，因为法老是根据女神玛阿特的旨意来统治人间。玛阿特对于官员来说就是秉公执法；对于祭司来说就是虔敬神灵；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辛勤耕耘；对工匠来说就是精雕细琢；对于士兵来说就是英勇作战。总之，玛阿特就是各守其职，社会井然有序，和谐美满。法老政府通过玛阿特这样的神灵控制着埃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在古埃及形成了一种和谐文化氛围。只有在这样的国度里，科学技术才能长足发展。为了研究尼罗河，天体星空图被绘制出来了；为了合理分配河水，土地一次又一次被加以划分，于是几何学诞生了。3000 多年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们之间形成了相对和谐的关系，这种和谐关系促使人们之间相互协作的愿望不断加强，集体主义在这里大放异彩。在这种和谐关系中，一座座金塔建成了，一座座神庙竣工了；在这种和谐关系中，伟大的埃及文明诞生了。

结 论

综上所述，在古埃及和谐文化形成中，自然因素是基础，人文因素是灵魂。在人文因素中，灌溉农业营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法老的制度建设和宗教发展是构建和谐文化的中心内容。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之间既互相关联又互相促进，二者的互动构建了古埃及的和谐文化。从古埃及和谐文化形成的原因中我们受到如下启示。

第一，尼罗河环境形成的绿洲文化中包含着爱好和平、集体主义等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因素。这种关系可以为当今人们所借鉴。当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应对各种安全问题，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灾害天气、恐怖主义等，如果不团结合作，哪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面对这样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人类应向古埃及人学习，团结合作，既要建立国内的应急机制，还要建立应对危机的全球机制；不仅要创建和谐的国内秩序，还要构建和谐的国际关系，应对共同的危机。第二，法老政府利用灌溉农业，建立起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这种做法也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当今人类的合作已不再局限于农业领域，但仍需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如航空航天、宇宙开发等领域中发扬集体主义，精诚合作。

第三，法老政府利用宗教文化向人们灌输生态保护思想，敬拜自然神灵，这种做法虽然不适应现代社会，但可以启示我们：优化人文生态环境，实现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良性互动，从观念意识到行为方式再到生活习惯全面实行革命性转变，从制度安排到政策选择再到方法途径全面体现人文生态理念。如果不顾及地球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而片面追求高速发展，等待着人类的将是灭顶之灾。要实现上述目的，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对全体成员进行公民教育，通过提高公民素质来实现上述变革。今天的政府要充分利用立法保护环境，通过公民教育实现生态文明社会，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近代以来的工业发展消耗了过多的地球资源，那种一味追求 GDP 的时代应该成为历史，未来的社会将是生态文明的社会。古埃及和谐文化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值得当今的我们深思。

9. Social Structure and Despotism of Ptolemaic Dynasty in Ancient Egypt

Guo Zilin

Abstract: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Ptolemaic Dynasty in ancient Egyp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mplex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relatively fixed grade and class relationships. As foreign rulers, the kings of Ptolemaic dynasty used legal and judicial methods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individual members. Without break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grades and classes, the kings allowed elite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o have opportunities to enter the ruling class through establishment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of ruling class as personal property, which made these elites follow the leadership of kings strictly and eased the conflict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that guaranteed nearly 300 years of autocratic monarchy's ruling of Ptolemaic Dynasty in ancient Egypt.

Keywords: Ancient Egypt; Ptolemaic Dynasty; social structure; autocratic monarchy

10. Origin of Harmonious Culture in Ancient Egypt

Zhao Keren

Abstract: Harmoniou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It includes not only the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people and society, but also the harmony within human beings. Harmoniou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Egypt could continue for more than 3,000 years of prosper. Harmonious culture was formed in the Nile, influenced by both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The natural factor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of the Nile basin and oasis where ancient Egyptians lived their life. The

human factors were mainly the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irrigated agriculture of ancient Egypt , and the core of that civilization is the Egyptian religion.

Keywords: Ancient Egypt; Harmonious Culture; Origin

11. A Trial Analysis of Some Key Problems in Studies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of Central Asia

Huang Minxing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put forward by Peng Shuzhi is an important theory of historic stud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 the following problems are quite important for the studies of Central Asian history: the influence of th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climate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civilization; the features and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in Central Asia;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the relations between and historical change of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 in Central Asia;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 national groups and cultures in Central Asia; the basic pattern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other areas , originating from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level;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eign conques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the leaping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n civilization; the role of wars in the civilization exchange in Central Asia; the routes of the civilization ex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ir influence; the influence of repeated clashes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 in Central Asia; the periodicity of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and the transition of Central Asia in the modern times.

Keywords: Central Asia; history; Civilization Exchange; problem